

有限理性问题研究综述

白 冰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成都, 610074)

内容摘要: 人类对于理性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 经济学家对有限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本文主要通过弱约束条件下, 对有限理性的认识理论进行详细的梳理, 以便更好的为现代经济学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字: 有限理性 约束条件 博弈

安迪·克拉克 (andy. clark) 认为, “理性”是一个不太切实际的概念, 它忽视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他还认为: 人类的大脑并不是在完全信息下进行完全推理的机器, 其行为并不总是满足收益最大化假定。受多种制约, 人脑的推理只能是有限的。显然, 对于有限理性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解释。一是受时空特征的制约, 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正如阿兰·斯密所说, 人脑在其活动范围与容量方面是令人叹服的, 然而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导致有限理性的根源。人脑经常会用低成本的、依其先天生态特征多少有点可靠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二是指完全信息的获取也是不现实的。比如人类信仰、道德、习俗、惯例、传统以及获取信息而必须付出的成本、代价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信息的完全获取。从生态学上讲, 现实问题通常要求迅速做出实时反应, 而这一过程无法进行大规模的信息收集、综合和推理。很多人类行为的规律性, 一部分与大脑模块性质有关, 另一部分起源尚不清楚。大多数人具有这种特征, 但不是每个人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来, 也决定了有限理性。三是环境的多种局部模式 (multiple partial models) 构成或许能最好地服务于实时的适应性行为, 在此过程中收集的信息不必设法整合成前后一致的整体, 而且甚至不用把它转换成一种通用的中心码。

基于上面的认识, 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非理性行为先进行一个说明。不少学者认为, 非理性行为包括: (1) 有约束的理性行为。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指因外在因素 (如信息不安全、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信息处理成本) 导致人类的理性不能充分发挥; 二是指由于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 即人的大脑机能的局限导致的即便是有用信息的前提下而由于脑力机能的限制无法认知、选择、判断并决策。三是指因外在因素 (如习俗、惯例、历史传统、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等) 导致人类无法对客体对象做出判断。(2) 非约束 (但行为主体自身不愿意最大化) 的理性行为, 又称选择性理性。它是指可以最大化理性, 但行为主体基于自身原因而不愿使其理性最大化, 而是仅仅选择一定程度的理性, 理性被当作一个可以无限划分的连续函数, 而非有与无、是与非的二元变量, 主体以何种程度、选择何种形式、均取决于主体自身。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之所以受到批判, 就在于它混淆了个人认知水平和外部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在于它把外在的一切约束都视为“强外在约束”而忽略了“较弱约束下”的个人认知的现实性。本文研究的就是

指第二种理性，即“较弱约束下”的个人认知行为，而这种行为的人脑思维就是“理性不及”、“理性受到约束”，理性受到限制，即较弱约束条件的限制。

一、基于约束条件下的有限理性

1、有约束的理性

（1）以奈特为代表的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起源说

奈特（knight.frank hyneman， 1885-1962 年）是生于美国的经济学家，其博士论文《论商业利润》（1916 年）中关于价值分配理论经修改于 1921 年以《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为名出版，书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进行了详实探讨。他认为，风险的特征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以及因此将它作为一种可保险成本进行处理的可能性。估计的可靠性来自其所遵循的理论规律，或者来自稳定的经验规律性。他还认为真正的不确定性同可计算的风险应有“根本的区分”。在此“不存在任何一种有效的基线来把事例归类”。人们对不确定性不能清晰而准确的下定义。在处理不确定性方面，直觉知识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人在知晓怎样处理不确定性这一问题的能力方面的知识显得比对食物的直接知识更加准确”。行动的效果常常与产生它们的愿望相去甚远。欲望本身很不稳定，变动与增长则是其内在本质。“普通人实际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是满足他已有的欲望，而是更多、更好的欲望。”。因此，人是一个探索者和实验者，是一个对未知的，也许不可知的真理的追求者，是一个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比科学更能理解的生灵。

他认为：人类对目标的探索性质，其爱好的无限多样性与易变性，科学家与社会科学的课题之间关系的相依性，都使他认为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对研究人类来说都是极不恰当的。他在跟 T. 哈奇森（T. hutchison）的温和答复中写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引入了一种自然科学里全然没有的维度。因此，根本的谬误“就是相信社会科学应该或是能够是一种与自然科学具有相同意义的科学”。

由此可见，奈特并不认为理性能够解决社会生活的一切，相反，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其渺小和有限的，正因为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极端渺小，因而要以理想的视野和手段去探索不可知的真理，这显然是荒谬和可笑的。然而，更为可笑的是人类却不知道这种人类自身的“无知”和“愚蠢”。他因此而感到绝望的是政治生活中他们将永远不会甚至永远不能被认识。

正如杨小凯所说，“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

奈特的贡献在于运用其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技术定义，强调不确定—风险的二分法作为一种利润理论的中心概念。特别地，他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可还原和不可还原的成分，可还原的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不可还原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性。风险可以依据数学概率形式加以分析，真正的不确定性是数值概率理论无法解决的。这种分类既不是互相排斥的，也不是相互独立的，

不能看成是可分离的成分，对此问题的解释必须明确地依此，即完全理解企业家在资本市场、利润的本质及决定产量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法则。他进一步把不确定性归结为知识的不完全性，把不确定性看作是内生的，属于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范畴，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设。

早在 1921 年，Knight 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Georgescu — 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 和 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

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它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

（2）有限理性的奠基人——西蒙的观点

“有界理性”认为人类的选择被看作不是以总的极大化行动来表示的，而是被视为一系列的特殊决策。这些决策相互间并非完全融合，他们在全息信息的情形下做出，并都建立在有限反应的基础上。其结果与按照一致性的或根据自身利益的最优化来考察的理性行为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正如西蒙所说：“当然，由（有界理性）行为模型所描述的那种理性并没有最优化。它甚至不保证我们决策的一致性。实际上很容易表明，由具有这些特征的有机体做出的选择不取决于各种选择被提出的顺序”。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最早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西蒙（Simon）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为此，西蒙将理性进行了区分，他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指出：“一项决策如果真能在指定状况下使一定的价值最大化，则可称之为客观理性的”。一项决策所达到的价值最大化，如果是相对于决策者的主观知识而言的，那它就是主观“理性”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如果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就称为“自觉”理性的。这个过程如果是（由人或组织）有意进行的，则称为“有意”理性的。如果一项决策是指向组织目标的，我们就说它具有“组织”理性，如果它侧重于个人目标，我们就说它是“个人”理性。

正因为“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于是 Simon 试图找到“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他从三个方面做了说明。而（1）不完全信息或知识的不完备性；（2）处理信息的成本；（3）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或经验决策。他认为：“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有意义的部分”？

西蒙通过解释“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两个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对有限理性作出进一步说明。所谓实质理性是“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所谓过程理性是“行为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现实中的“过程理性”却在理论表达时被大多数经

济学家默认为更偏向于结果的“实质理性”。有限理性是对理想的“实质理性”的否定，是对现实的“过程理性”的回归。实际上，理性的载体应当是“思维的程序”，而非“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体并不拥有超出其认知能力之外的复杂计算能力，而只拥有进行合理行动步骤的资源，只能追求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而无法完全实现某种工具价值的最终“极大化”。总之，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决策目标等诸多方面全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

2、新制度经济学有限理性的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阿罗—德布鲁范式，力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搜寻市场均衡，力图用有效市场理论来讨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秩序。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自动达到和实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愈来愈被现实生活所冲击。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Simons 用“有限理性”来说明人类不具起理性的现实，换言之，对理性的限制意味着不是所有的经济交易都可以由合同是市场来组织。这也正如 krep (1990 年) 所说：一个具有有限意识的人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是他发现做到这一点成本极高，并且，他发现他无法预测到所有的偶然事件，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他就会在事前为可能发生的意外的事（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的事后做准备。

认识到过程理性的重要性，并且用程序理性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是西蒙的贡献。然而，尽管西蒙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但经济学对有限理性的研究并未达成共识，西蒙也曾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决策者目标函数作为有限理性三要件引入经济分析，在这里市场交易引入了新的概念，即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正是由于成本的存在限制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

不少经济学家从西蒙有限理性的三个方面出发，把有限理性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细化、吸收。

（1）不完全信息导致的有限理性

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是产生有限理性的重要根源之一。信息不完全，是指面对浩如烟海的外部信息，任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都只能摄取其中与自己从事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小部分信息。哲学认识论上所谈论的可知论和人的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只是就可能性而言才能成立，而且也要通过世代相继的人类发展来实现。就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任一现实的实践主体而言，想要搜集与自己的经济活动相关的全部信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况且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信息资源的动态可变性，从而使拥有完全信息更加成为不可能。加以“无休止地搜集信息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标志，如果情境具有某种紧急情况的话尤其如此”。因为那样会贻误宝贵的商机，丧失绝佳的经营决策机遇。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活动的对象及相关规则掌握的信息数量不对等，通常销售者比购买者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人为地进行信息封锁和欺骗，使购买者面临着信息不足或为大量虚假信息所困扰的被动局面，从而进一步加剧其信息不完全的状况，增加交易活动成本。与这种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相适应，人的理性就只能是有限理性。

（2）因信息成本或交易成本导致的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说史上正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作出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科斯（Coase）最早将交易成本引入了经济学并将其界定为市场交换的成本。科斯在其著名的企业理论中，指出企业取代市场的临界点是“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Dahlman 则将其具体化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是稀缺而昂贵的商品，获取信息需要支付费用，这笔费用叫作“信息费用”，而信息费用实际上只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科斯的经典论文(1937、1960)给出了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威廉姆斯和张五常又将科斯的理论作了一般化处理。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信息费用乃至全部交易费用的假设立场严重脱离现实。交易成本与有限理性这两种基本假设紧密相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人们能够不花任何成本(代价)获得完全信息，则人的理性就不会是有限理性，而必然是无限理性，人们也就不会仅仅满足于比较满意的“次优”结果，而会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惟一追求的行动目标。但是，由于“最大化通常需要出奇多的信息和计算，如果这些商品并非免费，那么行为人可能会发现遵循为自己所建立的某种经验规则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不管可能存在的能带来全局性的更高利润的其他最大化法则”。也就是说，既然有了交易成本为正(大于零)这个前提，人们追求更优(或最优)的结果就要花费额外的时间与精力，“那么建立一些即使并不导致帕累托最优结果的均衡规则并且遵循它可能是符合参与者的利益的”，“因为改进规则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导致的成本可能远远超出了收益”，“因为他们的时间与精力在他处配置会更为有效率(例如，配置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制度的产生就是人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时间与精力)而作出的安排。可见，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各种规则制度就没有必要存在。

(3) 将非理性的决策手段比如心理方面的个人偏好、社会习俗、信仰等纳入经济学视野，即将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

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证明，倘若计算机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照固定规则决策。绝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经济当事人进行理性决策，但理性是不完美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合理假定当事人的认知能力，经济模型的预测应该和决策的微观水平数据一致，包括实验数据，经济学家对当事人选择行为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决策，但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当事人的决策不仅体现在目的上，而且体现在过程上。在决策过程当中，决策程序、决策情景都可以和当事人的心理产生互动，从而影响到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对经济总量的理解来自对个体行为的理解。有限理性和学习过程会导致决策的偏差以及结果演变路径的随机性，从而产生异常行为，这种异常行为增添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同时加剧了有限理性的约束。简单来说，行为经济学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为起点的，而终点又强化了有限理性的约束。

行为经济学认为，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相互之间是互动的和关联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就被推翻了，在这些互

动过程中，偏好的一些条件下被产生出来，并在和环境变化的互动中演化着，这就构成了当事人围绕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学习过程的存在使得行为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的分析，而不像传统经济学那样重视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内生性，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这种对人的基本假定构成了其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关键所在。通过假定有限理性和偏好、禀赋内生性，行为经济学表现出和传统经济学非常不同的理论核心。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假定。通过假定的改变，行为经济学家眼中的当事人不再仅仅自利，人们会考虑利他，也可能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叶航等(2005)用演化均衡模型解释了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的进化机制。行为经济学的产生源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决策理论，当个体进行决策时，理性往往是有限的，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来看，有限理性假设和偏好内生是核心。

二、选择性理性

事实上，人的行为往往是矛盾的、往往是多面性并存。一方面行为人总是精于计算和算计，但另一方面在决策时又常常忽略细节和成本，冲动和惯常思维成为决策的手段。

哈维·莱宾斯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X 效率学派的创始人和首要代表。在考察个人行为的过程中，莱宾斯坦提出了选择理性理论、“全权委托”偏好原理和惯性区域理论。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 X 效率理论的理论基础。

莱宾斯坦认为，个人既不象新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的理性，也不象卡内基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是具有有选择的理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个性中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倾向是确立或坚持标准，通过计算和注意细节努力追求最大化目标。这方面的个性是“理性的”自我，是在决策前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的那部分自我。莱宾斯坦把这种倾向称为“超我功能”。正是这个功能“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努力去计算和采取理性行为。另一种倾向是“倒退回去，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遵循自己的“动物精神”。莱宾斯坦称这种倾向为“本我功能”。这种功能导致我们“不受约束”，使我们不愿(但不一定不能够)去计算和采取理性行为。这两种功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妥协，决定了个人具有有选择的理性。选择理性理论并不排除完全理性，但又认为完全理性只是个人在个别情况下的极端表现：在通常情况下，个人行为只表现出有限度的理性。个人实际选择的理性程度，与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二次关系的特征。换句话说，在过低或过高的压力水平下，个人行为所表现出的理性程序都是有限的；只有在适度的或最优的压力水平下，个人行为才会表现出完全理性的特征。

莱宾斯坦在讨论个人努力水平的决定时，提出了惯性区域的概念，它是指一组努力状态，从其中一种状态移向该组状态之内或之外的任何其他状态，所涉及的效用成本均大于效用收益。一般地说，惯性区域是指一组行为界限，在这个界限内，行为的变化所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引起变化所必需的成本。80 年代后期，莱宾斯坦对惯性区域的解释有所变化。此时，他除了继续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说明惯性区域的形成外，还把惯性区域的产生归结为人类感觉系统的“不完善性”。

他认为，人类感觉系统具有“差异阈限”和“适应”两个特性。差异阈限特性表明，如果环境变化要被知觉的话，这个变化必须大于某个最小量；适应特性表明，人类对固定数量的热量的感觉会不断发生变化。人类感觉系统的这些特性减少了量值敏感性，部分导致了惯性区域的产生。

三、演化理性

1、哈耶克的演化理性

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虽然是人的天赋能力，是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并不是生而具有知识与善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倾向于按理性行动，个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并不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构成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否则就成了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主张理性的有限性，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滥用，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哈耶克坦率地指出，“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享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哈耶克认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的侧重点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但同样承认理性的建设性使命。承认了人的无知和理性的有限，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才不至于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设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这样自生自发的秩序才是可能的。

哈耶克相信，人类的心智是有限的，必然要借助于自发产生的社会制度来克服这种局限性。当然这种社会制度不是任意制定的，它应该是建立在人类合作的基础上的，经过选择和试错过程而得来的。从根本上说，人类心智就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人类心智永远不可能被人类自己的心智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自身能力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无法去了解、预测和控制心智。这种局限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对世界做出一种完全理性的理解。心理学的观点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它们能够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谓的具有发展特点的感知能力，在人类生命进程中独立发展，并发生变异。新获得的经验可以引发新的感觉，修正原先的分类模式，由此开始了一种选择性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取的知识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包含一切，它们不过是由一些抽象的联系、一些规律组成，虽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却同时又体现了人类对客观事实的无知。^③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对哈耶克以后发展的文化进化理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问题：获得知识并利用知识（这里指的是特定效用关系中的知识）绝非一种基本受意识支配的过程。更多的是来自经验，而经验更多体现在未经大脑思考的、个人的习惯行为中。

2、进化博弈论的有限理性

近年以来，部分研究者开始通过对博弈模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经济学的理性问题。囚徒困境模型说明，个人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群体无理性的后果。有限固定规则机制模型说明，在博弈参与者没有最优决策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的条件下，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有可能出现群体理性。在一系列演化博弈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参与者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纳什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的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由此可以看出，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了经济

活动中行为人的现实理性程度，而这一矛盾无法通过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得到解释。

陈学彬在其《博弈学习理论》中认为，经典博弈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参与人完全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在预测经济主体行为时存在着三大缺陷，即(1) 经典博弈论在均衡分析中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序贯理性，显然这个比理性概念要求更强的假定与现实相差太远；(2) 经典博弈论在处理不完全信息问题时，假定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知道随机抽取状态上的客观概率分布，并且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这三个假定与现实不相符；(3) 经典博弈论还要求“完全理性”的每个参与人正确知道其他参与人将会如何选择，但它不能完美地说明参与人的知识从何而来。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生物学家约翰·梅纳森·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为代表的将对等论运用在演化生物学上，提出了演化稳定，开创了对等论用非理性思想以解释等略均衡问题。借助于生物进化论，从生物对环境的本能适应性反应过渡到人类模仿学习的能动性反应。经典博弈论是在考虑到新决策主体行为互动情形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决策及决策的均衡问题，其前提是博弈主体具有完全理性，而进化博弈论则对博弈主体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前提假设，使得其推理更具有现实性。进化博弈论认为“经济中稳定的均衡状态是由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通过对被认为是最有利的战略逐渐模仿试探而最终达到的状态。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人们不可能准确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况，发现最佳行动的计算能力也有限，因而现实中的人类行为是在通过他人后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在经验法则的指导下，运用与归纳式决策相接近的决策方式，选择了所面临的各种状况相适应的手段。然而，路径的依赖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使得人类行为也难以实现最佳决策”

总之，进化博弈论从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出发，认为有限理性首先意味着博弈方往往不能或不会采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博弈方之间的策略均衡往往是学习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而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这种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博弈分析框架，与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为基础，研究生物种群形状进化和稳定机制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很相似。

进化博弈论以有限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克服了完全理性博弈分析脱离实际的问题，使得其理论基础更加扎实、实践性更强。同时，进化博弈论扩展和加深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人类理性和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对于经济问题和经济学意义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美) 约翰·N. 德勒巴克，(美) 约翰·V.C. 奈编，张宇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 2、阿兰·斯密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 3、(美) 约翰·N. 德勒巴克，(美) 约翰·V.C. 奈编，张宇燕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4、《什么是经济学的真理？》，《政治经济学杂志》，1941 年，第 32--50 页
- 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三卷，第 60 页--64 页

- 6、杨小凯：“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开放时代》，2002 年第 3 期，第 78 页
- 7、《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3 页
- 8、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 页
- 9、经济消息报主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年，第 96 页
- 10、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 11、刘小怡：“莱宾斯坦的 X 效率理论”，《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双月刊)》，1999 年第 1 期
- 12、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1937.4。中译本《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版，第 9 页

Bounded Rationalit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Bai Bing

(Chinese financial research centre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Abstract: For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is accompanied by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practic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economists who known rational understanding had experienced a long stage. In this paper, in a weak condition, it details a rational theory and in order to better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modern economics.

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 Constraints Game

收稿日期：2009-02-19

作者简介：白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2003 级博士研究生